

五言叢書

諫

言

張義忱 朱俊芳 王文達編著 春風文藝出版社



序 言

“谏”在古代是“直言规劝”的意思，一般是指臣下对君主的劝说。例如，春秋战国时期卿大夫对诸侯国君和周天子的规劝，秦以后朝臣对于皇帝的规劝，都属于“谏”的范围。作为“规劝”的“谏”有的是采用口头的形式，有的采用的是书面语言的方式，书面语言的方式即表、奏、议、疏等文体。《谏言》一书所辑录的就是古代优秀的表、奏、议、疏书，是古代散文中的一部分重要的遗产。

古之天子皇帝，之所以需要谏言规劝，一方面是因为国家之治并非一人之力所能奏效，皇帝虽为一国之主但不等于一人就能治好天下，所以必须听取臣子的意见，以提高统治的效能；另一面是因为皇帝身居高位，容易脱离臣下和国民，不容易听到臣下和国民的反映，因此必须听取臣子之谏才能知道自己治理国家的得失，才能改进自己的统治以巩固自己的地位。由此可知，谏言直接关系到国家的盛衰兴亡，直接关系到君王宝座之坐得是否牢稳，所以历代贤明的君主都是非常重视谏言的，他们是深知一言可以兴邦的道理的。

在中国历史上，早在周时就出现了以谏为业的人，这就是后来所说的谏官，《周礼·地官·保氏》中所提到的保氏就是专门掌管谏君的人，后来姓氏中的“谏”姓也是由“谏”之为业而衍化来的，相传汉代就有一个名叫“谏忠”的治书御史。按历史学家司马光的说法，中国历史上明确的设立谏官始于汉。他在《谏院题名记》中说：“古者谏无官，自公卿大夫至于工商，无不得谏者。汉兴以来始置”（一说为始于秦）。汉之谏官称谏议大夫，属光禄勋，隋炀帝曾一度废置谏官，唐时又复置。唐时的谏官，除谏议大夫之外又增设了补阙、拾遗，分别隶属于门下和中书二省。谏议大夫、补阙、拾遗又各分左右，即分为左谏议大夫、右谏议大夫，左补阙、右补阙，左拾遗、右拾遗。到了宋代，左、右补阙改为了左右司谏，左右拾遗改为了左、右正言，他们均在左、右谏议大夫的领导之下，负责向皇帝提出建议。辽金沿袭了宋的谏官制度。到了元代谏官被废，明洪武二十五年复置。谏官的官署称为谏院（或谏垣）。《旧唐书·元稹传》中说：“既居谏院，不欲碌碌自滞，事无不言，即日上书论谏职”。由此可知，谏院最晚在唐时就产生了。

谏言虽然是很重要的，但是给皇帝上谏并不是一件容易事。说它不容易，首先是因为谏言不一定被君王所接受。为了使君王能够接受，中国古代的上谏者是特别注重方式方法的。例如，有的采用直言的方式，“召公谏厉王止谤”就是直谏，直谏不绕弯子，开门见山；有的谏言绕了很多弯子，反而不一定收到好的效果，明朝洪武年间有一位刑部主事叫茹太素，他给皇帝写了一份上疏，绕了很多弯子，用了一万

七千多字，可是陈述意见的有用部分才只有五百多字，结果挨了一顿打；有的采用打比方的方法，如“邹忌讽齐王纳谏”，就是以自己之妻妾由于有私情而说不出真话为喻来劝齐王纳谏的；有的则以现身说法规劝君王，如颖考叔之以遗肉于母对郑庄公的劝谏；有的特别注重上谏的态度，如触轳之说赵太后，就是在赵太后消了怒气后见机行事的，而且是从谈生活琐事入手接触到根本问题，结果收到了预期的效果；有的则采取讽谏的方式，即在说笑、诙谐的言谈中劝谏君王，如楚之优孟、秦之优旃，都是以讽谏著称的。

楚庄王非常喜欢马，给马穿上华丽的衣服，圈在漂亮的屋内，让它爬卧于露床，饿了时喂以枣脯，死后装入棺槨，要象安葬臣子那样为之举行葬礼。优孟以幽默的方式，得出这样做会使诸侯们知道大王轻视人而重视马的后果，说服了楚王。秦始皇打算修建一个大猎园，并对大臣们说要“东起函谷关，西到歧州的雍县和陈昌县”，大臣们虽然不怎么赞成但却不敢说，优旃知道后以说反话的方式说：“这样大的猎园，可以放纵许多禽兽在里边，如果敌人从东方来，使麋鹿用角顶撞他们就可以得胜了。”秦始皇听出来这是讽劝自己，于是停止了修建。由此可见，上谏的方式是至关重要的。

给君主上谏，不被接纳是小事，重要的是触怒了君王而祸及自身。中国有句古话说，“伴君如伴虎”，在皇帝身边办事就很危险了，还要上谏批评就更危险了。可是臣子居谏院是不得不谏的，因为他们的责任就是上谏。上了谏疏，如果不报，这不打紧；报上去君主不看，也不打紧，因为这

样虽然算是白谏了，但是并无危险。打紧的是谏言触怒了君王，因为那将祸及自身；或则由恨怒而贬官、流放，或则投之牢狱，甚者还要杀头。有时一个人死了还不行，还要祸灭九族，使之断子绝孙。古之贤臣谏官，有的就是冒着被贬官、下狱乃至杀头的危险上谏的，他们把这样做视之为“忠”。所谓的“文死谏，武死战”，就包括着对于忠谏的歌颂。

谏官把自己之死于“谏”视之为保持名节，可是他们却看不到自己之死乃是昏君不纳谏而造成的；他们看不到君主之昏，这就有点近于“愚”了。《红楼梦》中那位“天下无能第一，古今不肖无双”的贵族公子哥儿贾宝玉，一生说了那么多痴话、疯话、呆话、傻话和怪话，可是他说的那句“有昏君方有死谏之臣”的话，倒是说出了一个真理，即：国君不昏，谏臣是不会去冒死去谏的。

谏言之所以会触怒君王，是因为谏的本质在很大程度上包括着批评君主的错误。《周礼·地官·保氏》中说，“保氏掌谏王恶”，这里的“谏王恶”就是要挑君王的毛病，就是要指出君王的过失，这当然要触怒君王。《墨子·非儒》中指出，“务美则美，有过则谏”，他也是把“谏”看成是指责过失的，而指出过失又常会逆耳，所以触怒君王也是必然的。但是“谏”毕竟是一种“忠”言，“忠”言虽然逆耳但却有利于行，所以古人把“谏言”比之为“谏果”、“谏笋”。“谏果”一般是指橄榄和余甘子，这两种果子吃时苦涩，吃过之后却有甘甜余味；谏言作为忠言，听之逆耳犹如果之苦涩，其有利于行，犹如食后之有余甘。“谏笋”指苦笋，苦笋苦而有味，忠谏就象笋之苦味，但其可以治国，就

是有了甜。尽管谏言犹如苦果之有余甘，尽管谏言犹如苦笋之有余味，但是它终究改变不了其逆耳的本质，所以有时也必然会触怒君王，这便是上谏的困难所在。

战国时的韩非子写了一篇重要的文章《说难》，文中说：“凡说之难，非吾知之有以说之之难也；又非吾辩之能明吾意之难也；又非吾敢横失而能尽之难也。凡说之难：在知所说之心，可以吾说为之。所说出于名高者也，而说之以厚利，则见下节而遇卑贱，必弃远矣。所说出于厚利者也，而说之以名高，则见无心而远事情，必不收矣。所说阴为厚利而显为名高者也，而说之以名高，则阳收其身而实疏之。说之以厚利，则阴用其言，显弃其身矣。此不可不察也。夫事以密成，语以泄败。未必其身泄之也，而语及其所匿之事，如是者身危。”又说：“贵人有过端，而说者明言礼义以挑其恶，如此者身危。贵人或得计而欲自以为功，说者与知焉，如此者身危。强以其所不能为，止以其所不能已，身危。”这里所说的“说”之难，就包括着（或者主要是）谏之难，难中就包含着危险，特别是贬官、罢职、下狱、杀头的危险。贬官、罢职就没有了饭吃，下狱坐牢要受刑罚，杀头就连性命也搭上了，这些不能不让为谏官者多虑。

韩非子还把为君主者比作龙，并说“龙之为虫也，柔可狎而骑也，然其喉下有逆鳞径尺，若人有婴之者，则必杀人。人主亦有逆鳞，说者能无婴人主之逆鳞，则几矣！”逆鳞即倒生的鳞片，人若是触及了它，必然被杀，没有几个能活下来。韩非子所说的人主的逆鳞，当是指臣子之谏对他的过失的指责，指出人主的缺点，触犯了人主之怒，就是所谓

的“批逆鳞”，“批逆鳞自然是危险的。可是作为忠臣的谏官，又不能因为怕触逆鳞就不上谏，那么怎么办呢！那就是要讲求方式，就是要把谏言写好，就是要把握意见的表、奏、议、疏、书等写得既能使其接受而又没有危险，即使是触了逆鳞也让他不致于发怒，这便是谏言的艺术技巧。

谏言必须以深厚的、足以说服人的理论为支柱，而这理论又不是出自谏者主观的臆造，所以擅谏者常以“臣闻”之类的形式为论，诸如“臣闻求木之长者，必固其根本；欲流之远者，必浚其泉源；思国之安者，必积其德义”（魏征《谏太宗十思疏》），“臣闻药不毒不可以蠲疾，词不切不可以补过”（《新唐书·柳泽传》）之类，其所要表明意思是：我的话是客观真理，目的在于增强可信性；谏言不是无的放矢，重要的是针对现实、朝廷或君主本人存在的问题，所以擅谏者常以“窃见”、“臣见”、“方今”之类的形式出现，诸如“窃见正始中，爰发存亡之诏，褒贤报功之功”（《魏书·李孝伯传》），“窃见顷年以来，力役兼总，……”（《旧唐书·后妃传》），“方今圣历钦明，天下乐业……”（《梁书·江淹传》）等等，意思是所陈之情是目之所见、耳之所闻的事实，目的是增强说服力，以事实说服君主；谏言常常以古鉴今，所以常常采用“昔……”的形式，意思是自己之谏是有古训的，是有历史根据的，不是为臣的独出心裁。谏言由于立意在于规劝君主，所以最后常以“陛下宜……”之类的形式提出所要说的意见，以此体现谏文的宗旨。

总之，谏言是有论点、有现状、有古训的、言之有物而又论之有理的应用散文。谏文之论表现了为谏者的胆识，以

古鉴今直指现实之弊，表现了为谏者的责任感、忠心。谏言由于使尽了谏者的方式，时而排比，时而比喻，时而分析，时而论证，时而谈古，时而喻今，所以多为有理有据、纵横捭阖的好文章。

马清福

1992.3.22 日于陵西小舍

目 录

序 言.....	马清福
先秦两汉.....	1
皋陶陈治国用人策.....	3
召公谏厉王弭谤.....	6
芮良夫谏厉王专利言.....	8
触詔巧谏赵太后.....	10
石碚谏宠州吁.....	12
伍员莫许越成疏.....	14
李斯谏逐客书.....	17
张释之谏勿以口辩超迁.....	22
张良上“宜缟素为资”策.....	24
张苍等除肉刑议.....	26
刘敬上和亲策.....	29
冯唐对文帝刑罚太重谏.....	31
路温舒尚德缓刑书.....	34
司马相如上书谏猎.....	38

晁错谏贵粟疏·····	40
东方朔谏诸讽奢靡·····	45
枚乘与吴王濞疏·····	48
贾谊众建诸侯策·····	51
王吉崇政本疏·····	59
桓谭上时政所宜疏·····	62
蔡邕陈政要疏·····	65
张衡禁绝图谶疏·····	68
崔骃戒权臣骄恣疏·····	72
杜林上勿增科禁疏·····	75
蔡茂上光武帝禁制贵戚疏·····	77
韦彪陈时弊疏·····	79
廖敬平上禁奢侈疏·····	81
耿弇谏刘秀集大计疏·····	84
刘陶上铸钱议·····	86
孔融荐祢衡疏·····	89
陈琳谏何进召外兵·····	92
三国晋南北朝·····	95
诸葛亮前出师表·····	97
庞统上取成都策·····	101
陆瑁戒劳师远征疏·····	103
鲁肃进联备抗曹疏·····	106
华覈上止营建疏·····	108
陆逊乞息亲征公孙渊疏·····	113
陆抗上求赦薛莹疏·····	115

陆凯进黎元穷困疏·····	117
曹植谏伐辽东表·····	121
王朗停营建务农耕疏·····	123
荀彧论取天下策·····	126
陈群上节葬疏·····	129
傅嘏应诏伐吴对·····	132
何夔用人详本谏·····	135
荀勖省吏省官议·····	137
傅玄上便宜五事疏·····	140
江统进陈五事疏·····	143
杜预黜陟考课疏·····	147
羊祜上伐吴疏·····	149
庾峻正风俗崇礼让疏·····	152
应詹务农重谷表·····	157
刘颂复肉刑疏·····	159
熊远勿任情破法奏·····	163
孔琳之止废钱用谷帛议·····	165
王彪之省官并职议·····	168
王导上设庠序正人伦书·····	170
庾亮上让中书监书·····	173
郭祖深僧尼还俗附农疏·····	176
萧子良上公役劳扰疏·····	179
徐孝嗣屯田急农疏·····	182
范泰上务本治国谏·····	184
薛虎子积谷戍边疏·····	187

江淹狱中上建平王书·····	189
元雍上官吏考陟表·····	193
高允上五异疏·····	197
刁雍修河重农积谷表·····	200
李安世上均田疏·····	203
萧宝夤上官考表·····	206
高道穆钱薄量轻表·····	210
隋唐五代 ·····	213
何妥上谏四事疏·····	215
李谔黜轻浮华伪疏·····	218
徐惠妃宽舒民力疏·····	221
岑文本居安思危疏·····	225
魏征谏太宗十思疏·····	228
卢僔安突厥策·····	231
虞世南上薄葬疏·····	235
张玄素上治洛阳官疏·····	238
苏安恒政归太子疏·····	241
傅弈诋浮图疏·····	243
柳泽上复斜封官疏·····	246
姚崇上玄宗十事疏·····	248
裴潆上方士丹术害人疏·····	250
辛替否上治道得失疏·····	253
韩愈谏阻迎佛骨表·····	256
柳宗元驳复仇议·····	260
王朴献开边策·····	263

李琪上经国之要疏·····	266
宋辽金元 ·····	271
王禹偁上疏言沙汰僧尼·····	273
欧阳修进《朋党论》·····	275
宋祁去三冗节三费疏·····	278
吴及上禁官童幼疏·····	282
范仲淹上十事疏·····	285
苏轼乞校正陆贽奏议进御札子·····	288
王安石上五事疏·····	291
陈亮安邦北伐疏·····	294
朱熹正君心塞私邪疏·····	297
陈靖务农积谷疏·····	300
赵普罢伐燕师手疏·····	303
懿德皇后上谏猎疏·····	306
肖韩家奴治道之要对·····	308
许古选将命相疏·····	312
徒单镒为政之术疏·····	315
完颜素兰论革弊政疏·····	317
完颜宗鲁南迁议·····	319
刘秉忠上治天下疏·····	321
不忽木重学崇儒疏·····	327
窦默上选贤任能疏·····	331
姚枢上不度大本疏·····	333
李元礼罢建五台佛寺疏·····	335
许衡遵汉法疏·····	337

明 清	339
叶伯巨论“太过者三”书	341
叶兑言天下大计书	345
高巍上燕王休兵归藩疏	349
刘球述时政十事疏	352
于谦防寇卫京奏	355
李东阳陈民情时政疏	357
王鏊上明世宗亲政疏	359
杨守隋劾内官刘瑾疏	363
李俊上时政六弊疏	366
戚继光蓟镇兵事疏	369
杨继盛劾嵩十罪疏	372
海瑞上世宗疏	377
靳学颜应诏上理财疏	381
刘宗周上矫时弊疏	385
范文程上进取中原书	388
李裊上疏论逃人法弊	390
熊赐履上弹劾鳌拜疏	393
黄爵滋上禁烟议疏	397
柴潮生进用人、理财三策	400
左宗棠上收复伊犁疏	404
林则徐禁烟制夷疏	406
康有为上皇帝第六书	408

先秦两汉



皋陶陈治国用人策

【说明】

当舜在位时，禹、皋陶、伯夷在帝前相互讨论治国方略。皋陶指出：要治理国家，应选用具备诚、信道德修养的人才；这其中还在于知人、爱民。禹赞赏说：能做到此种地步，还愁什么驩兜？还放逐什么有苗？还怕什么巧言令色的谄佞之徒？皋陶还进一步指出：治国的人才，应具备九种道德的修养，即：宽而栗、柔而立、愿而共、治而敬、扰而毅、直而温、简而廉、刚而实、强而义。凡具备这九德之人，才德出众，都能做官，百官也能敬慎而相善。反之，任用不具备九德修养的人，就会搞坏上天交给的政事，上天要用五刑中适当的刑处罚。

后来禹称帝位，建夏朝，举皋陶任士卿，皋陶的上述治国方略，不仅推进了夏朝的发展，而且对商、周也产生过积极的影响。

始事事^①，宽而栗^②，柔而立^③，愿而共^④，治而敬^⑤，

• 3 •